

毛泽东对日言论浅析

——1950年代为中心

刘 星

I 前言

由于体制的因素，很多情况下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这一点在毛泽东时代更为明显。比如中国建国伊始制定的“一边倒”、“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另起炉灶”等基本外交政策无一不出于毛泽东的谈话中。再如1970年代初也是毛泽东亲自策划了“乒乓外交”，最终导致了美中和解。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这一点也不例外。特别是中日建交之前，毛泽东在各种场合发表了内容颇为丰富的有关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的言论，限于篇幅和笔者的能力，本文将简析毛泽东1950、60年代初的对日言论。

在中日关系特别是政治关系恶化、以及中国国内对毛泽东的评价更加多样化的今天，对于毛泽东的对日认识也出现了各种评价。比如在言论相对自由的网络上，既有反对当时毛泽东等中国领导层提出的历史区别论、认为日本国民同样负有战争责任的言论；也有人引用当时毛泽东称赞日本民族以及“感谢”日本侵华战争等种种说法，指出毛泽东对日本的“误解”并进而怀疑毛泽东对抗战的态度。¹⁾而官方或正式出版物则基本上集中于解释中国对日政策的正确性和强调中国在道义、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并无一例外地肯定毛泽东对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战前军国主义与日本国民加以区别（以下简称区别论）以及以此为根据推行的民间外交、经济先行的对日政策。²⁾

但是，如前所述，毛泽东的对日言论实际上更为全面丰富，不仅涉及到毛泽东对世界局势以及中日关系中诸如历史问题等敏感话题的看法，也包括他对如何看待中国安全环境中的日本因素的各种考虑。本文将尝试结合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毛泽东对外交政策的看法简要分析毛泽东的对日言论。首先将简述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在对外关系中如何对日本加以定位；其次基于这种定位，毛泽东如何运用区别论来看待日本；同时在区别论之外毛泽东从中国安全的角度如何看待日本。在结论部分将进行简单论述并结合现状提出今后的研

究课题。

II 毛泽东对国际形势的判断

首先必须注意到当时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国际背景以及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国建国之始，正值美苏在欧洲的冷战趋向激烈，因此中国第一步就需要考虑如何判断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鉴于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性质，自然将政权归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因此在相当于宪法功能的“共同纲领”中即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自由的国家和人民，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站在国际和平民主阵营方面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以保障世界的持久和平”。³⁾这里十分明确地包含了几层意思，首先属于苏联阵营，反对帝国主义阵营；其次联合和团结的对象还包括更广泛的非帝国主义国家。与之相对应，反对的对象则更加集中于极少数的推行“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国家，具体而言就是美国，而非整个的西方阵营。

这种认识与毛泽东的“世界革命理论”与“中间地带理论”是分不开的。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斗争的哲学，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间的矛盾最终是不可调和的，⁴⁾因此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包括反殖民地运动），并将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合在一起。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还有共产主义运动）所要反对的正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看来，美国不但在世界范围内遏制社会主义，直接或间接镇压各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中国问题上更持敌视立场，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拒绝承认新中国，企图继续维持在中国的特权；在多边国际组织拒绝承认共产党政权，对中国实行禁运等。⁵⁾因此，在“世界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国际背景下，⁶⁾中国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出于安全、意识形态上等各个方面的考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与反对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中国的外交政策中。同样重要的是，本着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各国的人民都是革命

的潜在同盟军，从而人为地将各国的人民与“反动”政府相区分，认定在非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最终将走向反对政府的“民主革命”道路，因此“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⁷⁾那么，如何判断谁属于民族解放的行列，谁不属于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同盟者呢？这就是中间地带理论。

毛泽东早在1946年就提出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存在巨大的“中间地带”，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和被压迫民族等，而美国侵略苏联必将首先进攻中间地带，⁸⁾除了对殖民地和民族解放运动进行控制、侵略外，甚至要控制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反共的目的，（就是）占据从日本到英国的这个中间地段，欺负这些国家，控制他们的经济，在他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最好使这些国家都弱下去，包括日本德国在内”。⁹⁾因此争夺中间地带就成为毛泽东对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以后，毛泽东进一步将中间地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第一中间地带），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第二中间地带）。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¹⁰⁾而中国的战略就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其中毛泽东提到的“第二中间地带”甚至包括了英法等国。总之，毛泽东所设想的世界局势一方面出自当时冷战日趋激化的国际背景，但另一方面也通过采取“一边倒”等外交政策，将中国自身置于“中间地带”之外，定位于与美国相敌对的立场。

而能够将反对美国的目标与国际局势相结合的方法就是在归属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同时充分利用中间地带，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毛泽东当时认为美国“把自己放在几乎同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以及世界各国人民为敌的地位”，¹¹⁾尽管现在看来，这更多的是中国期望的那样而非现实，但当时毛泽东正是按照这一构想来推进外交政策的，即团结一切可以被用来反美的力量，“我们共同的敌人是美帝国主义，我们大家都是站在一条战线上，大家需要互相团结互相支持”，¹²⁾当然，如前所述，这里面不仅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也包括除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包括各国的所有人民。而这种思维和判断使得毛泽东的对日认识更为丰富。

毛泽东将日本置于中国的国际认识中的什么地位呢？根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毫无疑问日本属于第二中间地带，即资本主义国家的阵营。因此，既有和美国合作的一面，也必然有与美国矛盾的一面。这种想法始终存在。1962年1月的谈话中，毛指出“中间地带性质各有不同，有些国家有殖民地（英法荷兰比利时），

有些国家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的垄断资本，如西德日本，有些国家取得了真正的独立，如几内亚，马里，还有一些国家取得了名以上的独立实际上仍然是附属国”。¹³⁾1964年7月毛泽东进一步称“欧洲日本属于第二个中间地带，日本的垄断资本是不满意美国的，现在已经有一部分公开反对美国，另一部分人依靠美国”。¹⁴⁾

另外，至少在1950年代初，毛泽东甚至将日本也算作被压迫国家的范畴。1954年10月在会见尼赫鲁时毛泽东称：“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日本虽然是一个东方国家，但是过去他又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也欺侮别的东方国家，可是现在连日本都受欺侮了。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¹⁵⁾另外还同意印度等国邀请日本参加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这些都说明了在毛泽东的认识中日本处于一种很特殊的地位，这两种矛盾为中国改善中日关系反对美国创造了条件，正是在此基础之上，毛泽东运用了“区别”论展开了对日本的分析 and 推进对日政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区别论不仅仅是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区别对待，而且对日本政府与美国的“反动性”之间也进行了区别。

III 区别论之一：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

在这一层区别论里有两个含义，一是将发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本军国主义领导人与当时的日本国民（人民）相区别；一是将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与反对美国占领并进而反对日本“反动”政府的日本国民相区别，其实质就是将政府与国民分离，区别对待。如上所述，毛泽东深信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各国的国民由于是被压迫阶级，因此必将是革命的后备力量和同盟军，因此必须把国民与政府区别对待。毛泽东早在1945年的《愚公移山》中就明确提出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¹⁶⁾1959年1月也称：“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作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作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¹⁷⁾可见，区别对待“反动政府”与人民并不是中国对日政策的专利，符合毛泽东一贯的思路。

自然毛泽东对日本“人民”也是抱有同样感情的。如果单纯从策谋的角度、即中国出于尽快改善中日关系、恢复中日邦交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似并不妥。其主要表现就是在历史问题和战争责任上对日本军国主义与日本人民加以区分。这种区分“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尽管“如果历史上的日本人民在当时有足够高的觉悟水平和组织水平，那么日本军国主义对内滥施虐杀，对外

热衷侵略战争，就要困难得多”。但是，“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是不同的，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人民并不负其政治责任”。¹⁸⁾在这一点上，周恩来曾在谈话中引用2万6千余名日本军民在二战结束后通过参加人民解放军等方式自愿留在中国服务于解放战争的例子，说明“（日本）败战后一旦放下武器，日本人就跟中国人友好起来”。¹⁹⁾

对此，毛泽东表达得更加直率，更是充满了对日本人民抵抗美国、争取民族独立的期待感和信心。1955年10月在同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会谈时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表示中日两国国民“都属于有色人种，你们这个民族是个很好的民族，日本人谁要想欺侮他们，我看是不容易的”，随后表示对日本民族“谅解”，并且“吵过架打过仗”的事情“可以忘记”，“对你们过去欠的账再来讨帐，这是没有道理的，你们已经陪过不是了。不能天天陪不是，一个民族天天愠气是不好的”。²⁰⁾在1961年1月与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的谈话中，毛泽东极为明确地将日本“人民”与军国主义区分开来，并称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对于日本人民反而是胜利：“战败了，殖民地没有了，这对日本有利。失败对人民来说是胜利，有一部分人认为战败了没有面子，于是他们心中有愧，觉得干了坏事。这是因为他们对垄断资本和人民不加区别，过去的战争应有垄断资本、军国主义政府负责，而不应由日本人民负责，人民为何要负责？如果说人民要负责，那么大家都来反对日本人民，那还了得了。事实上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威胁欺骗强迫日本人民去当炮灰的”。²¹⁾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出于统一战线的考虑也好，或出于对日本人民的期待也好，并不希望将战争的责任置于日本国民。另外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从“亚洲人”的立场出发看待中日两民族间的关系，体现了其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亚洲人”的连带感的意识。可能“同是亚洲人”的思维也曾经引起了不少日本亲华人士的共鸣。

除此之外，对历史问题的宽容态度还体现了毛泽东另外一个思想，就是斗争需要反面教材，人民进行革命的觉悟需要反面教材，这样在毛泽东看来，日本的侵华战争却正好起到了这个作用，毛泽东曾说：“一部分（日本朋友）说日本侵略中国不好。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加入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并为此“感谢”日本的侵略。²²⁾1958年毛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更为明确地称“你们做了好事，正因为有了你们的侵略，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使我们团结起来，领导全国人民打走了你们，来到了北京”。²³⁾充分表现出其对日本侵华战争与革命胜利的辩证关系的想

法。无论如何，毛泽东对日本的侵略“既往不咎”是有其独特的价值观的，即在对日本人民与日本政府进行区分的基础之上期待日本人民通过斗争摆脱美国控制，建立摆脱美国统治的独立自主的政权。而这种政权即使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至少应该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同盟军”。

出于同样的理由，战后毛泽东在严厉谴责日本政府的反华政策的同时，不仅将日本国民“反对美国占领的群众运动”与“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解放运动”联系在一起。²⁴⁾还强调“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两者是有区别的，同日本政府的关系也有不同，有所谓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他们不完全一致。日本人民是我们的直接同盟军”。而战败反而使日本民族“因祸得福，卸掉了包袱，你们主动了”，这里的主动就是指日本人民也处在受压迫的地位，可以从事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因此更“希望你们保持现在的主动地位，搞好你们的事情，发展前途是光明的。你们每一个胜利都对我们有帮助，都值得我们感谢”。²⁵⁾

在1959年日本国内掀起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运动中，毛泽东并没有将此理解为这是日本国民从维护西方民主政治的立场出发反对岸信介政权独断专行的侧面，而仅从其认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角度出发将其理解为“基本性质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它在日本的代理人岸信介，……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²⁶⁾因此在赞扬日本的安保斗争时就明确提到：“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日本的岸信介和池田勇人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好朋友，日本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是美帝国主义迫使我们中日两国人民联合起来，我们两国人民都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就团结起来了”。²⁷⁾这一段话可能也是对毛泽东区别论的最好注释了。既说明了日本人民和日本政府的区别，也说明了日本与美国的区别。

IV 区别论之二：美国对日本的利用与压迫

这一区别论意在强调日本政府在追随美国实行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也存在受到美国压制、胁迫的侧面，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日本政府也是美国侵略政策的受害者，有“身不由己”的一面。也就是说，至少在1950、60年代初，在中国看来相对于美国的加害者和侵略者的地位，日本更多的是追随者和某种意义上的受害者。这种判断既符合统一战线的需要，也反映了当时对来自美国威胁的严重性的认识。

毫无疑问，中国在政治外交上将日本作为西方阵营

的一员。因此对日本政府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比如中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时就明确将日本作为条约的敌对国，并明言是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其后在对日和约、日美安全条约以及日台条约等一系列条约签订的时候都对日本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批判的主要理由可简单归纳为日本政府妄图复辟军国主义、追随美国的反华政策、反对日本人民的意志奉行反华政策等。²⁸⁾从这些谴责和批判中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最受到毛泽东谴责之处正在于日本政府对美国的从属性，充当美国的傀儡，比如在批判岸信介政府时毛泽东就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帝国主义在许多国家培养它的走狗，这些走狗是本国人民所不喜欢的，日本的岸信介就是这样的政府”。²⁹⁾“现在日本政府和美国缠在一起，我们不高兴”。³⁰⁾这里一方面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严格地区分开来，一方面也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与日本政府相区别，简而言之，对华敌视政策中日美处于“美主日从”的格局，美国是主谋，日本只是帮凶。在1957年会见泰国访华团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日本反对中国的行为“和美国反对中国是不一样的”。³¹⁾毛泽东的这种判断也导致了其对作为一个“国家”的日本的印象的多样性，即作为国家的日本，即追随美国敌视中国，又是美国占领政策和反共侵略政策的牺牲者和受害者。

在日美两国对华敌视政策中将美国列为“主犯”符合毛泽东所构想的中国外交的基本思路，即将国家关系简明地划分为敌我并一定以某国为主要敌人，或将其作为“万恶之源”。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再三指责美国利用日本、强迫日本从事反华的同时也对日本施以压迫，并公开声称“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这些指责可主要归结如下。

一，美国而非日本成为战后当时中国的敌人，“1945年以后中国的事情和日本没有关系。欺侮中国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日本。所以我们的仇恨目标转移了，不是日本而是转到了美帝国主义身上了”。³²⁾

二，出于反共目的，美国不仅纵容并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还利用日本遏制中国，从事敌视中国的行动。周恩来在其1951年8月发表的反对旧金山和约中最集中地指责了美国对日本的纵容：“美国占领当局不是在毁灭日本的制造战争的力量，而是违反远东委员会的政策，扩大日本的军事基地，训练日本的秘密武装，复活日本的军国主义团体，释放日本的战犯，开脱大批被整肃的分子，尤其在干涉朝鲜的战争中已经开始利用日本的人力，恢复和发展日本的军事工业，来支援它的军事侵略。……将日本再度推上曾经使日本濒于毁灭边缘的侵略道路，并且是服从于美国侵略计划并为美国政

府火中取栗的附属国和殖民地化的道路”，³³⁾同时，“美国利用这些地方（日本，菲律宾，台湾等）搞我们的鬼”，³⁴⁾“主要是美国（对中国抱有坏的意图），日美条约把中国沿海地区、也包括日本所解释的远东范围之内”。³⁵⁾

三，美国正在压迫日本，“美国现在尽犯错误，它排斥日本民族，奴役日本人民”，³⁶⁾在1964年1月甚至将美国列为“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一直遭受美帝国主义的压迫。美帝国主义不仅压迫日本的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者、宗教界人士、中小企业家，而且还控制日本的许多大企业家，干预日本的对外政策，把日本当作附庸国，美帝国主义是日本民族的最凶恶的敌人”。³⁷⁾而日美安全条约则是“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³⁸⁾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美国支配下的日本的想法却发生了变化，在对日关系中毛泽东在各种谈话中都不止一次地提到战后日本与战前日本的不同之处，除了在安全上暂时不能对中国构成现实威胁（详见后述），还有一点就是在国际社会上日本地位发生了变化，由帝国主义国家“降格”为资本主义国家，也就是说从敌人变成了可以团结、既斗争也团结的对象；从主权国家沦落为“半殖民地”性质的国家。例如，在促成亚非国家万隆会议、宣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1955年前后，毛泽东通过与各国领导人的谈话强调亚洲各国的团结，其中多次提到战后日本地位发生了变化。在于缅甸总理吴努的谈话中，毛泽东称：“过去亚洲有一个日本是侵略国，但是现在日本地位也起了变化，变成半被占领国了，处于困难的境地，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也不那么恨了，而是采取友好态度。如果日本军国主义再起，我们是怕的，缅甸印尼等国大概也有同感。但是现在的事实是，日本处于半被占领国的地位，日本民族受到压迫”。³⁹⁾“从有军事基地这一点来说是殖民地，但是还有个独立政府，这个政府被美国支配着，从这个意义上，又是一个半殖民地”。由此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在中日关系中需要区别对待的并不只是日本人民与日本执政者，还包括在美国与日本之间。

正因为将美国作为主要敌人，所以对日本政府的批评程度也随着中国对日本依附美国程度的判断而发生变化。比如周恩来在1954年8月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就曾表示对日本的“同情”和对抵抗美国的“赞赏”：“美国想搞一个东南亚条约组织，目标是针对新中国。美国还想搞东北亚侵略条约，杜勒斯要把李承晚，蒋介

石吉田茂搞在一起，日本已经表示不干”。⁴⁰⁾而随着1960年日本安保斗争平息和中日关系的缓和以及民间交往的恢复、增加，对日本的评价也随之缓和，1964年10月周恩来同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谈话时在谴责美国阻挠中日发展关系后积极评价了日本的对华态度：“日本仍然跟我们发展友好关系，特别是民间的友好往来更是日益频繁。……日本在复杂的情况下，排除种种困难，发展跟中国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是给予大力支持的”。⁴¹⁾

但是从其他言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这种对日本的同情和支持也包含着他对日本必然再次成为大国的观念：“日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怎么能让人来占领控制呢？日本必然会完全独立，成为和平的国家”。⁴²⁾此言前半句是毛泽东对日本未来重新崛起的判断，更接近于地缘政治中现实主义的判断，而后半句则是主观愿望，表明了毛泽东所希望的符合中国利益的强大后的日本。可以说，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而只有通过如前所述的诸如将政府与人民区别对待、将美国与日本政府区别对待等思想，才可以将两者结合在一起。一旦中国放弃或改变了日本成为“和平独立”国家的观念，那么前者反而就很可能成为担心日本成为强权的重要原因。那么，毛泽东是如何从中国的安全利益的角度看待日本的呢？

V 安全考量中的日本因素

如同外交的一边倒和反美统一战线一样，1950年代中国面临的安全问题十分明确，就是将美国作为最大的几乎也是唯一的现实威胁。因此往往容易忽略在安全利益中对日本是如何考量的。尽管毛泽东充分发挥其区别对待的理论来处理中日关系，但仍有一些对日本的“安全”问题的言论，反映了在安全问题上对日本的“放心”与戒心。

由于日本是战败国，又被置于美国的占领下，在1950年代可以认为中国并没有从安全利益上将日本视为真正的现实威胁。尽管《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明确规定条约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但同时又规定条约还将防止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因此其“核心实际上又是防止美国利用日本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问题”。⁴³⁾而周恩来则更明确地指出“我们所反对的方面，是条约里指出的与日本勾结的国家，这就是美国”，⁴⁴⁾不言而喻，中苏同盟的真正假想敌是美国。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在毛泽东的言论中出现了两种观点。首先，在短期内毛泽东并没有认为日

本是现实威胁，1956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的会议上提到是否能有12年的和平时间来从事工业化时说：“看来是有的。现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形势也有不同，主要是德国和日本与过去不同，挑战不大可能”。⁴⁵⁾在1957年12月又称：“现在我们不放心的是东部，当然我们不害怕日本菲律宾台湾和香港，而是害怕美国”。直到1974年毛泽东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时表示对日本“比较放心”，“在一段时间内”相信“日本人的和平意图”。⁴⁶⁾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安全问题上，毛泽东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敌人和对手。这可能出于毛泽东对日本国民的反美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期待，也可能出于反美统一战线的需要，当然当时日本的军事力和国际地位的确也不可能对中国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这一点也不会被毛泽东所忽略。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这并不能说毛泽东因为关注和期待日本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推行区别论就对日本成为“和平国家”的必然性、不再成为能够威胁中国的国家充满信心。就在上文中提到的与希思的谈话中，尽管毛泽东声称一段时间内相信日本的和平意图，但是马上又强调“将来很难说，但是我们不怕你们欧洲”。显然这种想法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考虑。50年代末岸信介政权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使得毛泽东对日本的军国主义提高了戒心，在与日本共产党的谈话中明确表达了对日本的担心：“日本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殖民地扩大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地全被剥夺了，他们很不甘心，想继续侵占殖民地，……岸要修改宪法第九条，是因为第九条束缚了他进行扩张，他要复活军国主义”。⁴⁷⁾这段针对岸信介政权的言论表明尽管毛泽东对“日本人民”充满信任和期待，但对作为国家的“日本”却并不放心，甚至认为日本“重温旧梦”也是一种必然。

在这一点上，周恩来的论述更为详细。1960年8月在与同日本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的谈话中在日本军国主义是否会复活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日方认为想复活军国主义的只是极少数人，周恩来对此表示异议，认为“这种可能性不能说完全没有。日本统治阶级已经有人这样想，美帝国主义也想培养这部分势力作为它侵略亚洲的先锋队。美帝国主义想利用日本人流血，使亚洲人打亚洲人，让日本为它火中取栗。……日本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是没有前途的”。⁴⁸⁾可见，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始终保持着对日本在安全问题上的戒心，并且在中国的安全利益上仍将日本列为潜在的威胁，并且，通过对岸信介政权的批判可以看出，一旦中国判断日本政府采取了对华不友好的政策，必然会提升对日本的警戒感，“军国主义复活”始终是在安全问题

上中国对日本的隐忧。

VI 结论——兼今后课题

综上所述，毛泽东对日言论极为丰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首先，从意识形态、“国际主义”的角度出发，运用区别论，将日本政府、日本人民和美国进行区分，并强调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与日本人民的连带感、同为亚洲民族间的连带精神以及对历史认识问题的宽容态度。不可否认，这其中包含政治外交上的考量，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对日思维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并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中日友好。而这些理想主义色彩和意识形态在今天强调“国家利益”的中日关系中已经愈发鲜见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运用的区别论、特别是将日本政府与日本人民相区别似过于从主观愿望出发，这种对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分析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也显示了毛泽东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不了解。在今天，区别论如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中的中日关系将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其次，毛泽东在中国的安全问题上尽管在当时的背景下以及受到区别论的影响，没有将日本列为直接威胁，但是，对日本重新成为军事大国的担心和忧虑却始终潜在于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想法中，并因日本对华态度的冷暖而变化。比如对岸信介政权的批判很多仍然被用于今天对日本的批判，只不过将词汇稍作改动。可以说毛泽东对日本重新成为大国后的担心一直持续到今天，随着区别论的减弱，这种基于地缘政治的现实主义思维正在逐渐占据上风。因此，日本成为什么样的国家？日本在地区安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地区安全中如何影响中国的安全等等都是中日关系必须面对但实际上仍未认真对待的问题。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思考的题外话，就是根据日美安全条约形成的日美军事同盟（日本称之为日美安保体制）对中国安全所产生的影响，这并不属于本文的论述范围，现仅就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在1950年代的发言简单加以分析。如前所述，毛泽东对日美军事同盟的基本判断就是美国利用日美安全条约控制日本，从毛泽东的区别论来分析，这种控制无疑是消极因素，压制了“日本民族”的独立与发展。但是继续观察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讲话就会发现在中国看来，日美同盟也具备防止日本违背美国意志“越轨”行事的功能，比如周恩来就表示“（日德）想摆脱美国，再搞扩张。西德和日本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要发动战争不那么容易”。⁴⁹⁾毛泽东也提到有点怕日本，“因为美国扶植日本的军国主义”。⁵⁰⁾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论述其实质并不矛盾，即

毛泽东等实际上承认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与否将是判断日本是否成为中国威胁的重要根据，进而为中美间就地区安全中的日本这一主题进行对话创造了前提条件。

实际上，中国对没有了美国控制的日本将何去何从表示出的担心随着1960年代后期起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影响力减弱、越南战争陷入困境而增加，这也是在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会谈时再三提起日本“企图树立地区霸权”可能性的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中美关系和解的大背景下，中国实际上部分肯定了日美同盟的存在价值，即通过日美同盟防止日本摆脱美国树立本国在地区的霸权。这一论题已超出本文所涉及的范畴，笔者希望在今后的论文中加以详细论证。

注释

- 1) 比如在网络上不少言论引用毛泽东“感谢”日本侵略的话来证明毛泽东的亲日态度。
- 2) 例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的《当代中国外交》、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林代昭《当代中日关系史》等。
- 3) 《共同纲领》，转引自谢益显《中国当代外交史》（以下简称《中国当代外交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 4) 例如在1957年1月的讲话中称“马克思主义就是扯皮主义，因为总有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中国资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Virginia, U.S.A.）《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12B学习资料（1957-1961）》（以下简称《别集》12B），第17页。
- 5) 《中国当代外交史》，第12-16页。
- 6) 《别集》12B，第16页。
- 7) 《别集》12B，第413页。
- 8) 《中国当代外交史》，第24页。
- 9) 毛泽东1954年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件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以下简称《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 10) 中苏关系出现危机后，东欧各国也被划入中间地带，即存在着东欧各国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 11) 《中国当代外交史》，第25页。
- 12) 《别集》12B，第143页。
- 13)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7页。
- 1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9页。
- 15)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63页。
- 16) 毛泽东《愚公移山》，<http://www.cnread.net/cnread1/zzzp/m/maozedong/1/008.htm>
- 17)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37页。
- 18) 《中国当代外交史》，第119页。
- 19) 1955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外交文选》（以下简称《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88页。
- 2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6页。
- 2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55页。
- 22)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40页。
- 23) 《别集》12B，第229页。
- 24)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5页。
- 25)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24页。
- 26) 〈1960年6月会见日本文学代表团〉，《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37页。

- 27) 《新华月报》1961年11期。
- 28) 林代昭著，渡边英雄译《战后中日关系史》，柏书房1997年，第46-50页。
- 29) 《别集》12B，第416页。
- 30) 1959年3月18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73页。
- 31)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1页。
- 32) 同注22)。
- 33)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0页。
- 34) 1957年12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03页。
- 35) 1960年5月27日与蒙哥马利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8页。
- 36) 同注25)。
- 37)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9页。
- 38) 同注29)。
- 39)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4页。
- 40)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85页。
- 41)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426页。
- 42) 同注30)。
- 43) 《中国当代外交史》，第35页。
- 44) 1950年3月20日，《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3页。
- 45) 中国资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 Virginia, U.S.A.) 《毛著未刊稿〈毛泽东思想万岁〉别集及其他12A 学习资料 (1957-1961)》(以下简称《别集》12A)，第248页。
- 46)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06页。
- 47)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6页。
- 48)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07页。
- 49) 《周恩来外交文选》，第386页。
- 50)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28页。